

## 舒曰敬與《皇明豫章詩選》： 明末江西詩壇的分歧與轉向

張藝曦\*

本文以明末江西詩壇為背景，探討舒曰敬（1558-1636）及其編纂的《皇明豫章詩選》對當時文學風潮的影響。文章首先梳理了江西詩壇從芙蓉社到龍光社與匡山社的發展脈絡，指出宗室與士紳的分歧與互動。舒曰敬晚年轉向詩作，編纂詩選以回應王世貞「江以西無詩」的論點，並試圖建立江西詩壇的地位。詩選以匡山社成員為核心，排除宗室詩作，形成與宗室詩社活動並行的另一條線。然而，明末風潮已轉向制藝，小讀書人逐漸從詩社流向制藝文社，詩與制藝的關係被重新定義。舒曰敬的詩選是復古派在江西的最後一曲，標誌著詩壇的轉向與新風潮的興起。

關鍵字：舒曰敬、皇明豫章詩選、匡山社、江西詩壇、復古派、制藝風潮、明末文學

---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本文主要圍繞一本少為人知的書——《皇明豫章詩選》展開討論。這本詩選流傳不廣，至今僅存的善本珍藏於北京的首都大學圖書館。但其編者舒曰敬卻是明末南昌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擁有眾多門人弟子，而這本詩選更是他晚年心血的結晶。該書編纂於文學復古運動逐漸衰退、制藝風潮興起的時期，透過對詩選的編排體例的分析，以及對相關人物的討論，既可看到江西詩壇兩條路線的分歧，還可以觀察到前後兩個世代在風潮交替變遷中所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與行動。

學界對於文學復古運動的研究，較多從詩文及文學史的角度切入，並聚焦於前、後七子及其相關人物。<sup>1</sup>後七子主盟時期，復古派在江西的影響力仍不大，當時具代表性的詩社，僅南昌的芙蓉社，由士紳與宗室共同主持。<sup>2</sup>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宗室逐漸成為主導力量，龍光社便是此時期宗室所引領的社集。儘管文學復古運動呈現出平民化的趨勢，<sup>3</sup>但這個趨勢在江西並不明顯。無論是芙蓉社還是龍光社，均顯示出較強的精英性。<sup>4</sup>

本文所關注的是江西宗室以外的復古派活動，並聚焦在詩選上。明中晚期江西以陽明心學及其講會獨盛，復古派詩社僅於南昌府一帶流行，<sup>5</sup>當宗室

- <sup>1</sup> 該領域的研究極多，此處僅舉出個人所知的幾本。如劉坡，《李夢陽與明代詩壇》（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便是以李夢陽為中心的研究。但相關研究並非只圍繞在前、後七子而已，如余來明，《嘉靖前期詩壇研究（1522-1550）》（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以嘉靖前期詩壇為題，而討論京城詩壇、南京詩壇、吳中詩壇三大中心。張清河的《晚明江南詩學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從群體的角度，討論晚明金陵詩學群、杭嘉湖詩學群、蘇松常詩學群。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則著眼在吳中派。鄭利華的近代《明代詩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則對有明一代詩學思想的發展與流變有更宏大的討論。
- <sup>2</sup> 宋代江西有江西詩派，迨及元代詩壇，江西仍為重鎮，元詩四大家中，范梈、虞集、揭傒斯俱江西人，引領元中後期詩歌風氣。明初江右派為五大詩派（越中派、吳中派、江右派、閩中派、嶺南派）之一，既是江右明詩之發軔，也是後起臺閣派的先聲。見李聖華，《初明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4章，〈江右派〉，頁152-195。明中期以後，江西的陽明心學獨盛，所以復古派詩社在江西始終不盛。
- <sup>3</sup> 請見吉川幸次郎，〈李夢陽的一個側面——古文辭的平民性〉，收入氏著，章培恒等譯，《中國詩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頁323-340。
- <sup>4</sup> 以下第一節對宗室與龍光社的討論，主要參考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發展與動向〉，《新史學》31：2（臺北，2020），頁65-115。
- <sup>5</sup> 江西的復古派詩社及活動，主要以南昌為中心，至於江西的其他府縣，則未必同步

主導詩社活動時，以士為成員的匡山社，在聲勢上並不足以與其並埒。於是舒曰敬與匡山社成員共同編纂《皇明豫章詩選》，這本詩選的特點是以士為主，而未錄宗室。於是一人、一社、一書，在宗室之外，宣示了士群體在詩壇的位置。

舒曰敬及其詩選也側面呈現了某種動向：即明末江西走向制藝風潮，以及小讀書人從詩社轉向制藝文社的動向。舒曰敬本是制藝名師，晚年轉向詩作而編詩選，但年輕一輩的小讀書人不僅疏遠於詩選，甚至有人批評之。這其實跟文學復古運動的退潮，以及制藝風潮之起的大背景密切相關。匡山社與詩選，或可說是復古派在江西的最後一曲，此後江西則走入另一個風潮及階段。

## 一、從芙蓉社到龍光社、匡山社

明中期文學復古運動，其聲勢流風約至萬曆（1573–1620）中期左右中衰，如廖可斌先生所指出，王世貞（1526–1590）卒於萬曆十八年（1590），此年以後，公安、竟陵相繼而起，而復古派漸衰。<sup>6</sup>但江西的復古派及其詩社則呈現較特殊的景況。隆、萬年間南昌一帶最具代表的復古派詩社——芙蓉社，是士紳余曰德（1514–1583）與宗室朱多燿（1534–1593）共同主持，由於參與詩社的宗室都有中高級的爵位，所以相應於這些宗室的其他成員，多半須有舉人以上功名。儘管江南一帶的詩社，常見山人或布衣加入，但江西芙蓉社則頗有精英及身份的色彩。

宗室的爵位多數可世襲（須降等襲爵），而且宗室常三五成群共同參加詩社活動；相較之下，士人不僅必須通過科舉競爭，而取得的功名也無法作世代傳承。此結構性的差異，使得宗室漸在詩社活動中取得優勢，以致於一個世代以後，南昌一帶的詩社活動已形成由宗室主導之局，其中尤以萬曆四十三

---

於南昌的發展。如湯顯祖以詩、古文辭及制藝著稱，更是重要的戲作家，但他主要在撫州府一帶活動，而跟南昌一帶的復古派成員較少聯繫。

<sup>6</sup>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第9章，〈復古運動第三次高潮興起的歷史條件及發展過程〉，頁363。

年(1615)的龍光社為典型代表。關於龍光社的活動，據載：

南昌郭外有龍光寺，萬曆乙卯(1615)二月豫章詩人結社于斯。宗子與者十人，知白之外，則宜春王孫謀、文翰，瑞昌王孫謀、雅彥叔，石城王孫謀、嶂鬱儀，謀圭、禹錫，謀珩、誠父，謀塚、藩甫，謀壘、辟疆，建安王孫謀、穀更生，謀聖、禹卿，謀劄、緝其詩曰《龍光社草》。郡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工部尚書事徐作汝念、刑部主事張壽朋冲猷序之。<sup>7</sup>

龍光社有兩點與先前的芙蓉社不同：一方面，主持者改以宗室為主，而參與社集的士紳如徐作(嘉靖四十一年[1613]進士)、張壽朋(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皆僅是附庸風雅或遊玩逸樂，<sup>8</sup>亦皆不以詩作見長。<sup>9</sup>另一方面，此次社集活動幾乎少見有人以詩作而為人所注目，這跟芙蓉社時期，余曰德、朱多燿等人以詩作為王世貞等人所稱，實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從一首徐「火勃」為龍光社所作詩，亦可窺見當時風氣。徐「火勃」(1570-1642)，字惟起，又字興公，福建人，曾與曹學佺(1574-1646)主持閩中詩壇。<sup>10</sup>他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道經南昌，與當地宗室有很頻繁的往來交流，並參加龍光社，為此作詩：

一帆風送大江來，正值龍光舊社開。謝氏池塘爭得句，魏家藩鎮寔多才。萬花影裏傳銀燭，百鳥聲中引玉杯。夜冷忽看微霰集，當筵授簡愧鄒枚。<sup>11</sup>

此詩詞藻華麗，但並沒有多少實質內容，這跟徐「火勃」的詩風不同，應是為了應和宗室的宴遊逸樂而作。

<sup>7</sup>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朱多燿字知白寧惠王第四子石城恭靖王奠堵之元孫〉，頁23。

<sup>8</sup> 如張壽朋便因宦途不遂，所以自我放逐，「慨然以神仙自命」，見[清]梁章鉅，《制義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5，「又曰張魯叟條」，頁22。

<sup>9</sup> 張壽朋曾以制藝聞名，甚至曾編選制藝選本，收錄一千八百餘篇文，而為人所諷誦。見[清]陳弘緒，《江城名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香月軒」條。

<sup>10</sup> 關於閩中詩壇的研究，請見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陳廣宏的《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則是從歷時性的過程，討論閩詩傳統的形成過程，以及在萬曆朝因各種詩社及地方性詩歌總集的大量出現而構建完成。

<sup>11</sup> [明]徐火勃，《鼇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1，〈禹錫文翰彥叔誠甫藩甫辟疆宗侯招飲同張魯叟比部分得才字〉，頁9。此會的參與者，除了徐作與張壽朋以外，其餘都是宗室。

明末江西宗室所主持的詩社，很快被視為是士紳及富貴子弟的閒暇樂事。且不論事實是否如此，但可確定的是，在士群體的眼中及傳言中，與宗室有關的詩社都流於這類逸遊的色彩。熊文舉（1595–1668）便曾談到崇禎年間（1628–1644）宗室在東湖結社，而張壽朋友主詩盟的景象，當時熊文舉只是生員，只是在湖旁讀書。<sup>12</sup>待他考取功名以外，徙居東湖，左右鄰的宗室仍然歌管之聲不絕。他說：

自予擢銓後，徙居東湖草堂，時當承平，左右鄰皆宗侯，朱門紫闥相望，夜月春風，畫船之游，歌管之聲不絕。<sup>13</sup>

當宗室主導南昌一帶的詩社活動的同時，另有匡山社起。匡山社員有九人，合稱匡山九子，<sup>14</sup>分別是戴九玄（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樊良樞（萬曆三十二年進士）、余槩、張超（萬曆四十四年[1616]武進士）、張儲、余欽耀、胡欽華、李旻、彭垓。<sup>15</sup>

芙蓉社是由宗室朱多燿與士紳余曰德共同主持的社集，而從芙蓉社到龍光社與匡山社，宗室與士群體，則有從合到分的趨向。如果說龍光社是由宗室主導，則匡山社則是承繼了士群體的這條線，尤其匡山九子跟先前的芙蓉社成員頗有淵源，如余槩是余曰德之子，<sup>16</sup>更讓人容易將匡山社往上連結到芙蓉社，如明末陳弘緒（1597—1665）便說：

豫章之詩，當王、李時，芙蓉社稱盛；已再盛於匡山社，則公安諸袁爭雄長焉。<sup>17</sup>

陳弘緒的這段話既稱許匡山社，但也等於側面邊緣化了宗室及龍光社。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舒曰敬所編纂的詩選，其目的正是為江西詩壇建立系譜

<sup>12</sup> [清]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3，〈朱禹卿詩序〉，頁17-18。

<sup>13</sup> 見[清]熊文舉，《侶鷗閣近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2，〈太學生七弟士彥小傳〉，頁137。

<sup>14</sup> 見[明]戴九玄，《匡山社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1635]刻本），無卷數，〈九子詠引〉，頁3。

<sup>15</sup> [明]萬時華，《溉園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2，〈戴大圓先生全集序〉，頁1-3。

<sup>16</sup> 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8，〈世選〉，目錄頁1。

<sup>17</sup> [清]陳弘緒，《恒山存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朱萬合刻詩序〉，頁9。

以張目，並使其足以與復古、公安等派相提並論。

有必要說明的是，儘管宗室與士群體之間有這些交集與分歧，但仍然是復古派的風潮中。宗室所主持的龍光社，延續朱多燧以來的復古派路線，而根據戴九玄留下的《匡山社集》，匡山社諸子的詩作應也傾向復古派。<sup>18</sup>至於舒曰敬雖不以詩作見長，但他也所推崇的也是復古派的詩作。

## 二、舒曰敬與《皇明豫章詩選》

### (一) 從資料集來看《皇明豫章詩選》

舒曰敬，南昌人，萬曆二十年進士，辭官居鄉 40 年，萬曆四十五年到天啟二年（1622）間曾主白鹿洞事。舒曰敬留下的作品不多，僅《隻立軒稿》7 卷，制藝 1 卷，以及所編的《皇明豫章詩選》。舒曰敬對詩作的立場傾向復古派，他頗推崇前七子中的何景明（1483–1521），如門人李旻在為舒曰敬的詩集所作序中，便說舒曰敬對詩「未嘗不首少陵而三復信陽之善擬也」，<sup>19</sup>信陽即何景明。

在文學復古運動流風下，李攀龍（1514–1570）編選的《古今詩刪》應是最重要的詩選之一。《古今詩刪》共 34 卷，收詩二千一百八十餘首。卷 1 至卷 22 選錄兩漢到唐代的各體詩歌，卷 23 至卷 34 選錄明代各體詩歌，中間盡略宋元兩代之作。此書至遲在隆慶元年（1567）左右完稿，此後坊間書賈割取原書，相繼出版各類的《唐詩選》的選本，諸如《唐詩廣選》、《唐詩選註》、《唐詩選》、《唐詩選玉》、《唐詩訓解》等書，可見此書的影響力之大。<sup>20</sup>舒曰敬當

<sup>18</sup> 如熊化（1576–1649）在為戴九玄的詩集所作序中，說：「法古者，吾惡其摹，摹古者，吾惡其似。大圓（按：戴九玄）則曰：但多學，多學則知古人可學而至，不必摹，不必不似也。」儘管已不是一意摹古擬古，但仍未遠離或背反復古派的主張。見〔明〕熊化，《靜儉堂集》（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卷 4，〈戴大園詩集序〉，頁 4。

<sup>19</sup> 〔明〕李旻，〈舒碣石先生隻立軒詩稿序〉，收入〔明〕舒曰敬，《舒碣石先生隻立軒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 39 年帥眾等校刊本攝製），卷首，頁 1。

<sup>20</sup> 以上請見鄭利華，《前後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7 章，〈後七子文學集團的組成及其活動〉，頁 375。

然知道《古今詩刪》，而他同時還提及楊慎（1488–1559）的《皇明詩選》（應即《皇明詩鈔》），與高棅（1350–1423）的《唐詩品彙》，可知這是他所參酌對照的三本詩選。對於李攀龍的詩選，舒曰敬給予「少許可以自尊」的評語，認為李攀龍的編選標準太高。對楊慎的則以「何僅僅也」評其所錄詩不多。<sup>21</sup>至於高棅（1350–1423）的《唐詩品彙》，舒曰敬則直指其「見地不超，假以姿性所近，妄為低昂」，<sup>22</sup>既有貶抑之意，也凸出己之詩選與高棅的淵源不深。<sup>23</sup>

舒曰敬對李、楊二人的詩選是推崇但稍有微詞的，或不滿其少所許可，或微憾其所選詩不多。所以他一方面放寬標準，盡力蒐羅，而向各方徵集詩作，<sup>24</sup>不少人也以受徵集為榮而投遞作品，<sup>25</sup>舒曰敬卻仍擔心「蒐羅未廣，掛漏相參」。<sup>26</sup>另一方面，舒曰敬並非詩家，擔心己之標準過於寬泛，於是另有人協助把關，舒曰敬說：

予黯淺寡昧，左提右挈，則余節侯（按：余槩）、樊尚默（按：樊良樞）是賴。二君深此道，能藥予之寬，而劑之以嚴，故所選無大紕繆。<sup>27</sup>

可知是余、樊二人協助審訂，以嚴守標準。二人皆匡山社成員。

<sup>21</sup> 為此書作序的陳仕賢也以「中或未盡其全」「君子豈徒多之為尚耶」加以迴護，見陳仕賢，〈皇明詩鈔敘〉，收入〔明〕楊慎選編，《皇明詩鈔》（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陳仕賢刊本），頁2。該書共10卷，但所收錄詩家不到百家，而且許多人都只錄一首詩作而已。

<sup>22</sup> 陳國球的研究指出高棅的《唐詩品彙》對前七子及以前的詩論並無影響，見陳國球，〈《唐詩品彙》對明前七子及以前的詩論並無影響〉，《嶺南學報》，新1（1999），頁416-552。若從舒曰敬的評論來看，《唐詩品彙》對後七子時期的江西詩論的影響恐怕也不大。

<sup>23</sup> 舒曰敬對楊、李、高三選本的評語，俱見〔明〕舒曰敬，〈序〉，收入氏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首，頁7-8。

<sup>24</sup> 萬時華的詩作得到舒曰敬的高度評價，許為古詩十九首之嗣響，見〔清〕許應鑠等修，〔清〕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62，總頁6868所錄舒曰敬語。另見〔明〕萬時華，《溉園初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上舒碣石老師〉，頁42。

<sup>25</sup> 如余紉蘭，後詳。或見〔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8，頁12-13舒曰敬信末所附的余紉蘭語：「先生罷官早，久家豫章，予以性拘僻，雖來往章門數十年，未登龍一謁。至先生垂老，傳檄徵豫章詩，予始得尺素通，遽蒙品異，悞相知之晚，隋入城請見，會先生伏枕，竟未面。兩地懷思。無何，遂仙去。」

<sup>26</sup> 〔明〕舒曰敬，〈序〉，頁8。

<sup>27</sup> 〔明〕舒曰敬，〈序〉，頁8。

《皇明豫章詩選》約在崇禎初年（1628）定稿，而舒曰敬則卒於崇禎九年（1636），顯示這是舒曰敬晚年心力所繫的一本書。舒曰敬頗高自標榜說：「豫章故有詩，選自予始。」<sup>28</sup>自許是第一部豫章詩選。舒曰敬的說法其實並不真確，明代江西最早的詩選，應推《皇明西江詩選》，這是韓雍（1422-1478）蒐集明代江西故老詩作，然後轉授韓陽選編，景泰年間刊行。韓雍是南直隸長洲人，韓陽是浙江山陰人，二人都非江西人。該集凡 10 卷，選錄明初至正統年間的詩人共 89 人，詩作 1190 餘首，流傳不廣，所以晚明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清初朱彝尊（1629-1709）編《明詩綜》，及曾燠（1760-1831）編《江西詩徵》，都未見此集。<sup>29</sup>舒曰敬應也未見此集，所以才會以為此前江西沒有詩選。

詩選在文學史上有很長久的傳統，《皇明豫章詩選》既是詩選，理應放到文學史的脈絡來談。只是這本書並不是只有詩選的這一面，還有其它面相。又或者說，舒曰敬所長既不在詩，於是他對這本詩選的定位，多著眼在當代江西詩壇的狀況，以及對這些詩壇的人物蒐集及表彰，更凸出了這本詩選作為資料集的面向，而且是舒曰敬所見所聞的江西詩壇人物資料集。詩選作為資料集，以及以詩選為江西詩壇張目，正是本文想討論的部分，以下將分兩方面談：一是該書所針對議題：江以西有詩或無詩的爭議。一是該書所選的人物，以匡山社成員為關鍵，於是讓詩選與匡山社相互呼應。

## （二）江以西有詩或無詩？

舒曰敬自述作此詩選的動機，是因對王世貞的江西無詩之說頗有異議，他說：

豫章故有詩，選自予始。予老且病，何以選？有激乎？其選之也，孰激之？弇州（按：王世貞）品隲古今，往往不異予意，乃序余德甫先生詩，推尊德甫，詆江以西為無詩，而廣肆其說。推尊德甫，固也；推倒江西以尊之，恐德甫亦不肖獨為君子。……赫赫豫章，寔為詩藪，

<sup>28</sup> [明]舒曰敬，〈序〉，頁 1。

<sup>29</sup> 以上參考周子翼的點校說明，收入[明]韓陽輯，《皇明西江詩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卷首，頁 395-396。

王故貶之，予復爭之，……辱詩甚矣，予不敢與弇州分此辱。<sup>30</sup>

舒曰敬表示，他對王世貞評論古今詩作，皆無異辭，但他對王世貞說江西「獨於詩未有以稱也」的評論，則完全無法接受。他認定這句話的意思是「詆江以西為無詩」，為了江西詩壇出一口氣，遂決心編纂詩選。如舒曰敬之子舒性所說：「甲戌（1634）秋，莫慎王元美囊詆西江無詩，遂銳成豫章詩選。」<sup>31</sup>

既然舒曰敬作此詩選是因王世貞而起，所以我們便有必要稍作討論。王世貞所針對的是江西詩派，江西詩派可溯源自王安石（1021–1086）與黃庭堅（1045–1105），而呂本中（即呂東萊）（1084–1145）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則落實江西詩派之名。<sup>32</sup>江西詩派流行於兩宋，到元及明初，廬陵劉辰翁（1232–1297）與泰和劉崧（1321–1381）等人雖以詩作著稱，雖被稱作江右派，<sup>33</sup>但已跟江西詩派沒有直接淵源。

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間，前七子引領文學復古，江西也受其沾染，其中以詩聞名而為人所稱道者，有嚴嵩（1480–1567）與熊卓（1464–1508）二人。嚴嵩在政治上雖有爭議，但其詩作則自成一格，如皇甫汈（1505–1584）便以嚴嵩為江西詩壇的代表，指稱何景明與李夢陽（1473–1529）力挽頹風，復還古雅以後，江西有嚴嵩詩作可與並美。<sup>34</sup>豐城熊卓則與李夢陽交好，李夢陽甚至在熊卓死後，為其收輯遺詩。<sup>35</sup>

但來到後七子時期，王世貞主盟時，王世貞並不滿意當時江西詩壇的景

<sup>30</sup> [明]舒曰敬，〈序〉，頁1-2。

<sup>31</sup> [明]舒性，〈敘〉，收入[明]宋應昇，《方玉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首，頁3。

<sup>32</sup> 關於江西詩派的研究，請見伍曉蔓，《江西宗派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5）。

<sup>33</sup>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137，〈列傳第二十五〉，頁3958：「（劉崧）善為詩，豫章人宗之為西江派云。」[明]胡應麟，《詩數續編》（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卷1，頁2：「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按：高啟）；越詩派昉劉伯溫（按：劉基）；閩詩派昉林子羽（按：林鴻）；嶺南詩派昉於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sup>34</sup> [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35，〈盛明百家詩集〉，頁9。

<sup>35</sup> [明]李夢陽，《空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2，〈熊士選詩序〉，頁1-2。

況，所作的總評價是——「獨於詩未有以稱」，<sup>36</sup>他說：

江右之名嶽大江，揚瀾左蠡，以奇麗甲天下，名相宏傳之業，有非他藩所敢望者，獨於詩未有以稱也。詩之病起於半山（按：王安石），而成於雙井（按：黃庭堅），是二君子，源非不出自少陵，特取其工與老之似，而加蛇足焉。半山之工，工而穿鑿者也；雙井之老，老而僻澁者也。又不幸而有呂居仁（按：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之輩，為之社而尸之，其毒浹於肌髓而不可救。明興，大紳（按：解縉）、子啟（按：曾榮）狂奔亡論，已弘、正之間，一二操觚者，意若有所濫觴，而識不稱才，篳路藍縷，雖勤而未闢。嗚呼，先生往矣，改社改木，疇能舍先生尸哉！<sup>37</sup>

據此段引文可知，王世貞對兩宋以來的江西詩派是有敵意的，所以他不僅批評王安石與黃庭堅二人之詩作「工而穿鑿」與「老而僻澁」。《江西詩社宗派圖》之作，更讓王世貞痛心疾首，認為此圖一作，王、黃二人之毒更不可救。正因不可救，此後雖有一二作者欲救正之，也因識不稱才而無效。

有意思的是，王世貞所不滿意的不只有江西詩派而已，他對前七子主盟下的弘、正年間江西詩壇也沒有正面評價，所以他用「識不稱才」稱之，也因此王世貞評熊卓的詩是——「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疏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sup>38</sup>甚至在一篇為江西瑞昌王府宗室所作的墓誌銘中，王世貞也藉朱拱樹之口評價熊卓，說：「何、李於弘、正間擅大雅，而我江右一熊士選，不能當邾莒。」<sup>39</sup>

在王世貞看來，此困境直到余曰德起方始有變。余曰德的詩作先是得到李攀龍的贊許，而把余曰德對比於熊卓，稱之為「大江以西一人」，推敲李攀龍的意思，應只是將余曰德高揚到熊卓等人之上。<sup>40</sup>但來到王世貞手上，由於

<sup>36</sup> [明]王世貞，〈序〉，收入[明]余曰德，《余德甫先生集》（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卷首，頁3。

<sup>37</sup> [明]王世貞，〈序〉，頁3-4。

<sup>38</sup> [明]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武林樵雲書舍刻本），卷4，頁8。

<sup>39</sup>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11，〈瑞昌王府三輔國將軍龍沙公暨元配張夫人合葬志銘〉，頁6。

<sup>40</sup> 此處有兩點必須釐清：第一，大江以西一人之詞，不是李攀龍率先使用，如元代劉

王世貞主張江西獨於詩未有以稱，須有余曰德，江西詩壇方才有足以稱道者，於是王世貞所說的「大江以西一人」，便給予余曰德極特殊也極尊崇的位置，既奠定余曰德在江西詩壇的地位，而因余曰德主持芙蓉社，於是也為該社張目。

既然王世貞以余曰德為分界點，於是便有兩個問題須作釐清或解析：(1)、與王世貞時代相近的人怎麼定位余曰德以前的嚴嵩、熊卓等人？(2)、舒曰敬既不滿王世貞全盤否定余曰德以前的江西詩壇，他如何以詩選回應？

首先，同時代人並沒有將李、王二人對江西詩壇的評語推到極端，儘管李、王二人高擡余曰德，但人們仍會從熊卓、嚴嵩等人談起，而且還會連及於與余曰德同時的其他人，尤其是共同主持芙蓉社的江西宗室，如喻均（1539-1605）便說：

吾鄉之詩，至嚴少師，古、近體彬彬大備矣，而氣骨少遜。逮熊士選而近體振矣，古詩靡靡無足采。余德甫、朱用晦（按：朱多燿）而近體大振矣，古詩亦瑰麗，而終不能不蹈曹生之嘅。<sup>41</sup>

朱多燿是跟余曰德共同主持芙蓉社的江西宗室，二人分別列名「續五子」與「後五子」。此處說蹈曹生之嘅，是以余、朱二人雖精於近體，惜古體未足以抗衡前代，由此帶出芙蓉社的另一位成員朱多燿，朱多燿也是宗室，他的古詩極佳，遂得以與余、朱二人並列。<sup>42</sup>陳文燭（1525-1595）也採類似的敘述

岳申便有同樣的用法，見〔元〕劉岳申，《申齋集》，卷12，〈祭熊天慵文〉。第二，李攀龍多次用「大江以西一人」的贊語來稱讚余曰德，但其實這只是期許余曰德能夠到達此境。

所以李攀龍在寫給余曰德的信上雖把余曰德高揚於熊卓之上，但這是在比較下而稱許其為大江以西一人，李攀龍說：「獻吉（按：李夢陽）時，則若熊侍御（按：熊卓）者，自今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耶！……德甫務工七言律，當作俱胝三行咒，不啻大江以西一人。」見〔明〕李攀龍，《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29，〈又與余德甫書〉，新編頁670。但在給徐中行的信，所用的詞就稍不同，而說余曰德是「將為」大江以西一人，而且必須有賴徐中行、王世貞時獎掖相成。見〔明〕李攀龍，《滄溟集》，卷30，〈又與徐子與〉，新編頁690。

<sup>41</sup> 〔明〕喻均，《山居文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原刊本），卷2，〈朱宗良詩集序〉，頁6。

<sup>42</sup> 此處喻均未將自己列入，但其實在當時也有人將喻均與余曰德並列，如熊文舉說：「是時吾鄉人文稱極盛，然好言道學、事功，而擅聲譽文壇者，余德甫先生而外，則稱吾邑喻邦相先生。」見〔明〕熊文舉，《侶鷗閣近集》，卷1，〈喻邦相雲間後山居稿序〉，頁87。

法，他在為朱孟震（1534-1593）的詩集作序時，並列熊卓、嚴嵩、余曰德、朱多燿等人，陳文燭說：

大江以西，弘、德間如熊士選（按：熊卓），嘉靖間如嚴維中（按：嚴嵩），  
隆、萬間如子深王孫（按：朱多燿）、余德甫，卓然名家。秉器兼之矣。

43

陳文燭此序作於萬曆十二年（1584），朱孟震在年輩上稍晚於余曰德，而陳文燭將其定位為是延續熊卓、嚴嵩、余曰德、朱多燿而大成者。簡言之，儘管王世貞過尊余曰德，但余曰德的詩作並未因此取得獨尊的地位，同時代人也並未因此忽略余曰德以外的其他人物。

這遂讓我們懷疑：王世貞的「辱詩」畢竟是數十年前事，加上同時代其他人受其「辱詩」的影響有限，為何時至明末，舒曰敬會對此耿耿於懷？除了對辱詩的不滿以外，舒曰敬應有尚未明言的現實目的。

這讓我們注意到舒曰敬在給余劬蘭的信上所說：「吾鄉詩派不下吳、楚。弟委意評選，十完七八。」<sup>44</sup>吳、楚應分別指以王世貞為首的復古派，以及源起於湖廣的公安、竟陵兩派（尤其是竟陵派）。可知舒曰敬此書，不僅僅只是針對王世貞的批評而作，同時也有回應江南與湖廣兩地詩派的意思。客觀來看，江西詩壇未必能夠與復古、竟陵等派並列，但我們若是回到舒曰敬個人的主觀立場來看，舒曰敬應認為江西是可以與吳、楚並列且毫不遜色的。

於是便來到第二個問題，即舒曰敬如何以詩選來建立江西詩壇的地位。

<sup>43</sup> [明]陳文燭，《二酉園續集》（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卷2，〈朱秉器詩序〉，頁23-24。另一篇為余曰德的詩集所作序中，陳文燭指出：「明興詩道丕振，吳、楚炳蔚，分宜若嚴惟中，豐城若熊士選，二公皆李獻吉所與，何可以豫章限之。今讀余先生集，又何讓二公哉！」既透露了對江西詩作不足與吳、楚並列的意思，尤其「何可以豫章限之」一句，更呈顯了陳文燭對江西詩壇的貶抑之意。但另一方面又推崇嚴嵩、熊卓與余曰德等人的詩作出於江西諸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陳文燭在同一篇序文中修改了王世貞的話，改為「大江以西之一快」。陳文燭形容余曰德及其詩作，說：「執牛耳之盟，七子竝駕，增雞林之重。四甫同稱，寧不洗宋人之派，而為大江以西之一快哉。」我們很難確定陳文燭確定的意思，但從文句來推敲，他很可能是把余曰德與嚴、熊等人並列，而不像王世貞獨推余曰德一人，所以作此修改。見[明]陳文燭，《二酉園續集》，卷2，〈余德甫先生詩序〉，頁34-35。

<sup>44</sup> 見[明]余劬蘭，《燕林藏稿》，卷8，頁11的舒曰敬信件。

### 三、詩選中的社與群：芙蓉社、匡山社與門人弟子

#### (一) 世選以及兩社間的連結

舒曰敬約從天啟到崇禎初年開始蒐羅各地詩作，但他畢竟以制藝名家，詩作非其所長，加上以一人之力不易蒐羅及評定全部詩作，因此詩選的編纂工作其實有得到匡山社成員的協助。匡山九子中以余槩與樊良樞二人的參與最深，<sup>45</sup>至於九子中的另一人李旻則是舒曰敬的得意弟子，<sup>46</sup>為舒曰敬蒐羅資料，自是不在話下。

詩選凡二十四卷，所錄詩作名義上囊括明初至舒曰敬所處時代，但實質以明中期以後作品為重。地域雖題「豫章」，但收錄範圍實限於南昌、瑞州兩府，尤以南昌府轄下南昌／新建<sup>47</sup>、進賢、豐城三縣詩人佔四分之三強。此三縣獨佔鰲頭，或與編者群之地緣密切相關：舒曰敬出身南昌，樊尚默為進賢人，而舒氏高足、「匡山九子」之一的李旻乃豐城人士。另一方面，文學復古與陽明心學運動雖皆稱盛於明中晚期，但兩運動的流行區域有別。陽明學及其講會在江西獨盛，於是江西各地多有心學講會，但同時期卻少見復古派詩社，而僅南昌的詩社（如芙蓉社）較為人所知而已。舒曰敬僅蒐羅南昌、瑞州兩府詩作，或與此地域差異的背景有關。舒曰敬說：

夫以三年精力所選，惟南昌、瑞州二郡，二郡中惟豐城、新昌幾無留良，其餘蒐羅未遍，掛漏相參，……<sup>48</sup>

舒曰敬將所蒐羅的人物，分作五類，分別是相國、翰林諸公、世選、特

<sup>45</sup> 舒曰敬表示，余、樊二人深於詩道，方才使此詩選無大紕繆，見〔明〕舒曰敬，〈序〉，頁8。余、樊二人又以樊良樞的參與程度最深。詩選各卷卷首大多數都有「南昌舒曰敬元直閱選，進賢樊良樞尚默同選」的題字，而有幾卷則題作「南昌舒曰敬元直閱選，余槩節侯進賢樊良樞尚默同選」，多了余槩。可推知舒、樊負責全書，而余槩則僅參與其中幾卷的選編。也因此，舒曰敬之子舒性則特別標舉樊良樞，指其是詩選的協作者，見〔明〕舒性，〈敘〉，收入〔明〕宋應昇，《方玉堂集》，卷首，頁3。

<sup>46</sup> 李旻與萬時華被舒曰敬稱作「二子吾顏聞」。見〔明〕萬時華，《溉園二集》，卷3，〈祭舒礪石先生文〉，頁祭3-4。

<sup>47</sup> 新建是南昌的附郭縣，兩縣同城而治，所以幾可視為同縣。

<sup>48</sup> 〔明〕舒曰敬，〈序〉，頁7。

選、彙選。相國僅 4 人，在卷 1。翰林諸公有 8 人，在卷 2。如其〈凡例〉所說：「首相國，次詞林，用世法也。就中隨見聞所及，以科名、年齒為先後，又或以得詩為先後。」<sup>49</sup>儘管不曉得舒曰敬說的「世法」有沒有實指，但可確定舒曰敬對這兩卷沒有他個人的特殊用意或安排。

以下是世選、特選、彙選三類。在此三類中，從卷 4 到卷 16，共十三卷之多都是〈世選〉類，應是本書最核心的部分。其中卷 4 至卷 12 是以父子入選，卷 13 至卷 16 是以伯仲入選。〈世選〉的標準是一家之內是否有多人以詩名世，如其〈凡例〉所說：「祖孫父子兄弟能詩者編曰世選」，所以往往兩人便可作一卷。至於〈特選〉（卷 17-21）與〈彙選〉（卷 22-24）則是以詩作多寡為標準，詩作逾十首以上者入〈特選〉，不及十首者入〈彙選〉，所以前者往往是數人或至多 9 人為一卷，而後者則可多達十餘人為一卷。

被詩選所選錄的眾多人物，還分作幾群。首先是隆慶、萬曆初年成立的芙蓉社成員，所收錄的包括余曰德<sup>50</sup>、胡汝煥（1543-1603）<sup>51</sup>、喻均<sup>52</sup>、方來崇（1533-?）<sup>53</sup>等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與余曰德共同主持社集的宗室朱多燿，以及其他以詩作聞名者如朱多「火貴」、朱多炆（1541-1589）等宗室皆未入選。

其次是匡山社成員。匡山社九子中，除了余欽燿以外的八人皆入選，且因各人簡介下皆註明著《匡山社草》，<sup>54</sup>所以很容易看出是匡山社成員。以下條列其卷數、卷名、姓名，以及姓名下所註：

卷 8 世選，余燾

字節侯，太學，著有《匡山社草》。

卷 9 世選，胡欽華

字實美，文學，著有《匡山社草》。

<sup>49</sup> [明]舒曰敬，〈凡例〉，收入氏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首，頁 1。

<sup>50</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8，〈世選〉，目錄頁 1。

<sup>51</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9，〈世選〉，目錄頁 1。

<sup>52</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7，〈特選〉，目錄頁 1。

<sup>53</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23，〈彙選〉，目錄頁 1。

<sup>54</sup> 儘管幾人所著書名皆近似，但並不是幾人合編或合著一本，而是各有一本。如目前僅存的戴大圓的《匡山社集》，便是其個人詩作的結集。

## 卷 12 世選，彭垞

字仲升，號渚渥，萬曆庚子（1600）舉人，官郡丞，著有《匡山社草》。

## 卷 12 世選，戴九玄

號太圓，萬曆甲辰（1604）進士，官工部郎中，著有《匡山社》、《酒遊人》諸草。

## 卷 14 世選，樊良樞

字尚默，號密庵，萬曆甲辰（1604）進士，官方伯，著有《二山》、《三山》、《二酉》、《匡山》諸草。

## 卷 20 特選，張超

字玄逸，號麟丘，萬曆丙辰（1616）武進士，官參戎，著有《匡山社草》。

## 卷 20 特選，李旻

字雲將，萬曆戊午（1618）舉人，著有《詠懷詩》、《匡山社草》。

## 卷 24 彙選，張儲

字明用，號曼胥，文學。

不少匡山社成員入〈世選〉，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跟此前的芙蓉社成員是父子，包括余曰德與余槩，胡汝煥與胡欽華，都是父與子的關係，於是讓人很容易把兩社作出連結。一是匡山社成員與自身的子弟或兄弟一起被錄入，包括樊良樞、樊尚燦（1587-?）是伯仲而入世選；<sup>55</sup>彭垞、彭份，以及戴九玄、戴國士（?-1649），都是父子關係。<sup>56</sup>這也讓人好奇匡山社之後是否將有另一個社集延續而起。

宗室仍未入選。儘管與匡山社同時的宗室主導龍光社活動，但皆未入選。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參與龍光社的士紳張壽朋<sup>57</sup>、徐作<sup>58</sup>，以及與宗室往來的王士昌（1561-1626）<sup>59</sup>、羅治<sup>60</sup>等人，都在詩選上有名，但偏偏就是獨缺宗室。芙蓉社作為復古派在江西的代表性社集，是由士紳余曰德與宗室朱多燿共同

<sup>55</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4，〈世選〉，目錄頁 1。

<sup>56</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2，〈世選〉，目錄頁 1。

<sup>57</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8，〈特選〉，目錄頁 1。

<sup>58</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23，〈彙選〉，目錄頁 1。

<sup>59</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8，〈特選〉，目錄頁 1。

<sup>60</sup>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21，〈特選〉，目錄頁 1。

主持，而一些宗室的詩作也得到王世貞的肯定。此後宗室所主導的龍光社等活動，更令匡山社相形失色，但如今匡山社成員幾乎全數入選，而宗室卻完全被排除在外。以上種種現象並不尋常。

詩選既是由舒曰敬與匡山社成員共同編纂而成，刻意不錄宗室，應有匡山社成員與宗室競爭的意思。儘管匡山社在社集活動上遠不如宗室所主持的詩社活動能夠引領視聽，但藉由參與詩選的編選，舒曰敬與匡山社藉由這種靜態而無聲的形式，在宗室以外建立另一條線、另一個群體，與宗室的社集活動並行成為雙軌。

不僅如此，以祖孫父子兄弟等血緣關係，而不是以詩學傳承作為〈世選〉類的標準，這種擴充成員的方式，跟加入芙蓉社的宗室往往會連同同房支的父兄或族人共同參與社集活動，在形式頗為相似。這也讓人不得不懷疑舒曰敬設立〈世選〉一類，有可能是為了擴充士群體的人數，以抗衡宗室。可惜資料有限，我們對此無法逕下斷語。

## （二）門人弟子與滕王閣社

第三群人，則是舒曰敬的門人弟子，舒曰敬的門下弟子甚多，而且不少都有文名。根據舒曰敬詩集的〈校刻門人姓氏〉<sup>61</sup>上有名者，分別有：宋應昇（1578-1646）、萬時華（1590-1639）、喻全祀、陳維泰、陳維恭、李旻、李光倬

<sup>61</sup> 〈校刻門人姓氏〉請見〔明〕舒曰敬，《舒礪石先生隻立軒稿》，卷首，頁1。列名舒曰敬詩集卷首的門人弟子及其功名如下：

帥眾，奉新人，萬曆44年進士

汪應婁，南昌人，萬曆37年舉人

汪龍躍，南昌人，萬曆40年舉人

袁時奇，功名不詳

魏士淳，南昌人，萬曆40年舉人

甘惟重，功名不詳

陳宗虞，南昌人，崇禎年貢生

宋應昇，奉新人，萬曆43年舉人

袁崇正，功名不詳

陳維恭，進賢人，萬曆43年舉人

涂紹燧，進賢人，萬曆47年進士

喻全禔，功名不詳

李光倬雖未列名詩集卷首，但也是舒曰敬的弟子，萬曆43年舉人。

等人。依序排列如下：

卷 5 世選，宋應昇

字元孔，萬曆乙卯（1615）舉人，任大令。<sup>62</sup>

卷 11 世選，萬時華

字茂先，文學，著有《溉園》《歲暮》《田居》諸稿。<sup>63</sup>

卷 12 世選，喻全祀

字仲延，文學。<sup>64</sup>

卷 15 世選，陳維泰、陳維恭

陳維泰，字孟來，號二同，官別駕。

陳維恭，字仲來，萬曆乙卯（1615）舉人，官州守。<sup>65</sup>

卷 20 特選，李旻

字雲將，萬曆戊午（1618）舉人，著有《詠懷詩》、《匡山社草》。

卷 20 特選，李光倬

字仲章，萬曆乙卯（1615）舉人。

這些門人弟子都頗得舒曰敬所器重。對宋應昇與萬時華二人，舒曰敬的評價是：「江以右，最能詩者，惟宋元孔與萬茂先耳。」<sup>66</sup>李旻與萬時華二人，則被舒曰敬許為「二子，吾顏閔也」，<sup>67</sup>就像孔門中的顏回、閔子騫一樣的人物。喻全祀則是始終隨侍在側，可說是舒曰敬最親近的門人弟子。<sup>68</sup>推測舒曰敬對這些門人弟子是寄予厚望的，也因此，崇禎七或八年左右，以萬時華為首舉行的滕王閣社，標榜紹承匡山九子而起，應有受到舒曰敬的影響。當時

<sup>62</sup> 同卷是：宋景（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子宋介慶（嘉靖十九年[1540]舉人）、宋和慶（隆慶三年[1569]恩貢）。宋應昇則是曾孫。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5，目錄頁 1。

<sup>63</sup> 同卷有萬民命（萬曆七年[1579]舉人，官知府）。子萬時華、萬時升（太學）。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1，目錄頁 1。

<sup>64</sup> 同卷是喻全祀之子喻周（文學），父子皆以詩作著稱。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2，目錄頁 1。

<sup>65</sup> 二人因兄弟而入世選，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 15，目錄頁 1。

<sup>66</sup> 這是舒性引述舒曰敬的話，見〔明〕舒性，〈敘〉，頁 3。舒曰敬尤其賞識宋元昇的詩作，並因無法錄入更多宋應昇的詩作而感到非常可惜。

<sup>67</sup> 〔明〕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3，〈祭舒碣石先生文〉，頁祭 3-4。

<sup>68</sup> 像「二子，吾顏閔也」的話，就是喻全祀代為傳達的，見〔明〕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3，〈祭舒碣石先生文〉，頁祭 4。

李旻已卒，宋應昇在外任官，所以以萬時華為首舉行社集，而萬時華說：

吾屬方尋滕閣之盟，以紹九子。<sup>69</sup>

但滕王閣社已跟過去的詩社不同。此時所舉行的詩社，更像是在制藝文社之餘而行，所以滕王閣社的成員的當時制藝文社的成員幾乎重疊。<sup>70</sup>制藝文社已凌駕於詩社之上成為主流。(後詳)

### (三) 作為邊緣人的余紉蘭

詩選的選錄，還從門人弟子延伸到一些邊緣人，如余紉蘭。余紉蘭，字猗叔，號廣莫，南昌府奉新縣人，與宋應昇同縣。余紉蘭曾有諸生的功名，但後來棄去，屏居郊外不出。儘管據地方志所載，湯顯祖、舒曰敬、萬時華等人，對余紉蘭「咸以為忘形友，雅推服之」，<sup>71</sup>但恐怕是過當之譽。若根據余紉蘭所留下的文集來看，他倒是曾經跟南昌的一些小讀書人共同研習舉業，其中多有舒曰敬的門人弟子，如余紉蘭說：

同盟之人，有元孔(按：宋應昇)、元禮、仲章(按：李光倬)、晦若(按：衷晦若)、茂先(按：萬時華)，今盡以次軒翥矣。<sup>72</sup>

但後來余紉蘭不知何故而放棄舉業，從此自我放逐。若據其自述，此後他的經歷頗多艱辛，所以他一再感歎「行義道塞」<sup>73</sup>。他似曾受肉刑，而說——「竟受劓，行義路斷，慮溝壑之早填，遂自放於瀟湘蒼梧之墟，秣陵石頭之畔」<sup>74</sup>。

舒曰敬未識余紉蘭，是在詩選已近完稿時，才因宋應昇之推薦而知其人其詩。<sup>75</sup>所以舒曰敬在信上跟余紉蘭說：「非宋元孔津津推重，幾終失之余猗

<sup>69</sup> [明]萬時華，《溉園二集》，卷2，〈戴大圓先生全集序〉，頁3。

<sup>70</sup> 關於天啟、崇禎年間南昌制藝文社與詩社的關係，請見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發展與動向〉第五節的討論，尤其是頁96-98。

<sup>71</sup> [清]呂懋先等修，[清]帥方蔚等纂，(同治)《奉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卷12，〈人物五·遺獻〉，頁80。

<sup>72</sup> [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7，〈萬茂先〉，頁23。

<sup>73</sup> [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8，〈余元禮〉，頁1。

<sup>74</sup> [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8，〈徐大章〉，頁3。

<sup>75</sup> 見[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8，頁11的舒曰敬信件：「而壓卷則藉佳咏以為重，計授劓當在秋冬見。」可推知是在詩選接近完成時才收錄其詩。舒、余二人

叔矣」。<sup>76</sup>宋元孔即宋應昇。余紉蘭的詩作入〈特選〉，值得注意的是，全書 24 卷，僅此卷下有小字附註「山人」，以標示此卷所收錄者的身份。

余紉蘭對於能入詩選十分興奮，在給舒曰敬的回信上，甚至用「活我又何深」一詞來形容當下的心情，他說：

近仰先生以趙州眼，丹鉛詞壇，刪集吾郡諸名人詩，信足樹上國之赤幟，成西江一代文章。其惠世一何厚，張楚一何微。昔馮北海之《紀》，不擇瑕瑜；李濟之《刪》，專求片玉，度今日之政，選鋒固若《品彙》之謹嚴，收類預如《史記》之博採，凡委巷之間，閉戶自造之侶，皆得效一線以補綴。……敢陳一編，冒昧以獻，苟得藉元孔（按：宋應昇）先容，……先生活我又何深，惠新吳又何普哉！骨弱不能支，無由匍匐，遙瞻闕里，謹東向稽首，奉尺素以告下執事焉。<sup>77</sup>

馮惟納（1513-1572）的《古詩紀》與李攀龍的《古今詩刪》二書都是極具代表性的本子，而余紉蘭極推崇詩選，所以稱此詩選可以與二書並列，甚至更有過之。

但當舒曰敬熱衷於詩選時，新起的制藝風潮則吸引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從詩社往制藝文社流動，即連舒曰敬的門人弟子也轉往這個方向。於是我們一方面看到最重要的制藝文社——豫章社的舉行，集結來自南昌、撫州、吉安三地的制藝名家，而南昌這邊的成員幾乎都出自舒曰敬門下。緊接下來在萬曆四十三年及萬曆四十六年（1618）兩科鄉試，則是舒曰敬的門人弟子的豐收期，許多人考取舉人功名。

---

並無私交，所以余紉蘭自述雖曾多次往來南昌府城，卻從未登門拜訪過舒曰敬。余紉蘭說：「先生（按：舒曰敬）罷官早，久家豫章，予以性拗僻，雖來往章門數十年，未登龍一謁。至先生垂老，傳檄徵豫章詩，予始得尺素通。」見〔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 8，「又附錄碣翁來書二章」之後的余紉蘭語，頁 12。

<sup>76</sup> 舒曰敬信，收錄於〔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 8，「附錄碣翁來書二章」，頁 11。

<sup>77</sup> 〔明〕余紉蘭，《燕林藏稿》，卷 8，〈明府碣石舒公〉，頁 9-10。

## 四、兩股風潮的選擇：

### 舒曰敬與門人弟子的歧異發展

#### (一)、在詩與制藝之間：舒曰敬的選擇

當舒曰敬與匡山社成員在詩壇上與宗室競爭時，明末的風潮則已轉往另一個方向，也就是制藝寫作。舒曰敬並沒有跟這股新風潮脫節，甚至應該說，他及他的門人弟子便在此風潮中。舒曰敬是萬曆二十年進士，以制藝名家，陳弘緒（1597-1665）便指出，江西以制藝名者共五人，舒曰敬即居其一。陳弘緒說：

隆萬間江右以制藝傳者，新建鄧文潔以讚，臨川湯若士顯祖，安福鄒泗山德溥，進賢李媿庵光元，共先生（按：舒曰敬）而五；迨臨汝陳、艾、章、羅出，海內或推置於五先生之上，艾千子獨不然其說。<sup>78</sup>

五先生以舒曰敬、李光元是南昌府人，而似以舒曰敬門下弟子較多。南昌一帶的士人很多都出自他的門下。<sup>79</sup>

也因此，舒曰敬晚年從制藝轉向詩作是很大的變動，不僅如此，他在為《皇明豫章詩選》所作的序，明言他對制藝已失去期待，他說：

夫有益于世之人，持世者也，而持今日世道者，制義與詩而已矣。制義之持世也顯，詩之持世也微。顯則七篇八股，倖一日之遇，而得志于時，宗社安危，生民休戚，惟其所造耳。時流捉筆，務駕先正以自雄，問所造于宗社生民者，視先正何如哉？予甫壯投閑，妄以世教自任，憶前士習倚魁，予怖其卒卒鯁鯁焉，取成弘諸大家極力表章，而身為之鵠，冀以反經息邪慝。無如陽九百六之劫運，斯文邁之，則有

<sup>78</sup> [清]陳弘緒，《江城名蹟》，卷2，頁39。

<sup>79</sup> 所以在舒曰敬的詩集卷首的校刊門人名單，便都是南昌一帶的士人，如前文談到，舒曰敬跟這些門人弟子都維持很密切的關係，不少人的詩作被他收入詩選中。熊文舉也談到，他的兄長熊文登，諸生功名，也在舒曰敬門下。見[清]熊文舉，《侶鷗閣近集》，卷2，〈松風主人〉，頁131。明末編集《詩慰》的陳允衡，即熊文舉的門人，熊文舉的文集，便是陳允衡與其他兩位門人共同編纂校閱的。

群魔作敵，走眾盲如狂，取科名如券，而世不知有聖賢矣。不知有聖賢，又安知有君父？貪風戾氣，濁亂乾坤世界，遂有今日。予滋懼，徐思轉移世風之微權，莫神于詩。詩也者，持也，所以持志而持世也。<sup>80</sup>

舒曰敬先指出：「持今日世道者，制義與詩而已矣」，把制藝與詩並列為可持世道，然後比較詩與制藝。他先說「制藝之持世也顯」，指稱若能夠以制藝造就人才，而人才之施政作為，便可有益於國計民生。但接著他便坦言他無法轉移制藝之風氣，甚至說出「予滋懼」這樣沮喪的話。於是舒曰敬轉向詩壇，以及寄希望於詩之「微權」。但舒曰敬不以詩作著稱，於是他所期待的詩之微權，便是藉由編纂《皇明豫章詩選》來彰顯。

## （二）下一代的走向：以制藝為主，以詩為輔

但舒曰敬的幾位門人弟子則在萬曆四十三年舉行豫章社，這是當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制藝文社，據載：

大冢宰李長庚任江西左布政，其子春潮才而好奇，合豫章諸能文者為豫章社，臨川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東鄉則艾南英，泰和則蕭士瑋、曾大奇，吉水則劉同升，南城則鄧仲驥，豐城則楊惟休、李旻，進賢則陳維謙、李光倬、陳維恭，皆郡邑間最馳聲者，而南昌、新建首時華與萬曰佳、喻全祀，時華尤為所推服。<sup>81</sup>

能受邀與會的都是當時制藝寫作上已頗有文名者，所以僅十餘人而已。主要分作三批：一批是萬時華、喻全祀、李旻、李光倬、陳維恭、陳維謙等人，來自南昌府，而且都是舒曰敬的門人弟子。一批是臨川陳際泰（1573-1640）、羅萬藻（?-1647）、章世純（1575-1644）、艾南英（1583-1646）等人，來自撫州府，被譽為「江右四大家」。第三批則是來自吉安府，包括蕭士瑋（1585-1651）、曾大奇與劉同升（1587-1645）等人。會後則由萬時華與李旻二人主編社稿《豫章

<sup>80</sup> 舒曰敬，〈序〉，頁2-4。

<sup>81</sup> 〔清〕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敦宿堂留書》，卷1，〈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頁39。陳際泰談到有南州大社，因同樣是李百藥及其子所主導，似即豫章社。若然，則該社尚有羅中魯（字）、葉當時（字）二人。見〔明〕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4，〈君子亭合社序〉，頁14。

社選》。

不同於舒曰敬在制藝與詩之間二擇一，門人弟子則是選擇並行，但有主從之別。門人弟子更傾向以制藝文社為主，詩社為輔。儘管在文社之外舉行詩社，如前述有滕王閣社以紹承匡山社，但這些詩社成員幾乎清一色都來自制藝文社，既須面對科舉考試的競爭，也因此不會有像余劬蘭這類山人或邊緣人的加入。若將此時的詩社成員跟芙蓉社相較，已有很大的變化。芙蓉社的成員中，士紳已不必再應試，而宗室本就跟科考絕緣，因此他們所追求的是詩作的價值。但此時的詩社，則都是必須寫作制藝以應試的小讀書人，至於山人或不必要應試的宗室，皆已不在此詩社中。<sup>82</sup>

隨著更多小讀書人趨向制藝及制藝文社，整個群體的走向便跟舒曰敬越來越遠。舒曰敬的門人弟子尚不至於直接反對舒曰敬，但一些跟舒曰敬關係較疏遠的人，便會更明白標舉自我的主張。這些人，有些是僅重制藝而不論詩，跟舒曰敬較無交集。但即使是以詩作著稱者，如徐世溥，也已跟舒曰敬的復古派立場及重視世選的主張，有很大的不同。

徐世溥（1608–1658）是明末南昌年輕世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與萬時華、陳弘緒等人並列，皆以詩及古文辭著稱。<sup>83</sup>陳弘緒的詩作有收入詩選，<sup>84</sup>而徐世溥之父徐良彥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詩作有被收入詩選的〈特選〉類中，<sup>85</sup>卻惟獨未見徐世溥其人其詩。這個疑問，可在徐世溥為舒曰敬之子舒性的詩集所作序中得到解答，徐世溥自述：

余成童，即以舉業受知碣石舒先生，……先生選豫章詩，使茂先（按：萬時華）來索，當時雖應之，而久久忘錄去，先生意恨甚，比其刻也，

<sup>82</sup> 由於明末開宗科，宗室也可應科考，一些放棄宗室身份而應科考者也會參加詩社。此處指的是沒有應試的宗室，如前文談到的那些在東湖宴遊的宗室。

<sup>83</sup> 如萬元吉說：「吾豫章人士以詩古文名當世者，……求其博通古今，確然有以自命，體用全備，可大可久者，獨推陳士業（按：陳弘緒）與徐巨源（按：徐世溥）二人而已。」萬時華長陳、徐一輩，又與萬元吉，所以此段未提及萬時華。清初來江西任官的施閏章則說：「豫章稱文詞家甚眾，其尤工而未遇者，吾愛徵君陳士業、萬茂先、徐巨源數人。自少時已聞其姓名而讀其文矣。」以上見〔明〕萬元吉，〈序〉，收入〔清〕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卷首，頁1；〔清〕施閏章，〈序〉，收入〔清〕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卷首，頁1。

<sup>84</sup> 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20，〈特選〉，目錄頁1。

<sup>85</sup> 見〔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卷19，〈特選〉，目錄頁1。

注先君姓氏下曰：「有子能詩，弗余示也。」余語茂先，先正愛才，一至此哉！以愛故恨，吾何以堪之。<sup>86</sup>

舒曰敬委託萬時華索詩，而徐世溥託言「久久忘錄去」，這個理由其實頗為牽強，以致於舒曰敬以小注表達強烈的遺憾之情。檢今日詩選徐良彥姓名下並無這段文字，推測是稿本有，但付梓前刪去。徐世溥對於舒曰敬的不滿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在前引短短的一段話中，便先後出現「意恨甚」與「以愛故恨」等情緒性的字眼。

舒曰敬是徐世溥的舉業師，所以徐世溥應甚在意舒曰敬對己之觀感及評價。但徐世溥仍未錄己詩予舒曰敬，則因他對詩作另有主張。他與舒曰敬見解及立場上的分歧，可見於徐世溥的這兩段話：

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佻於袁、徐，纖于鍾譚，此其無足大置數者。<sup>87</sup>

今世稱詩之士眾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寧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竊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為興觀群怨之資。論之大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為，為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為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sup>88</sup>

「萬曆五十年無詩」之說，等於是把舒曰敬所選的許多人與詩都刪去不計，包括匡山社諸子也不被計入。第二段引文出自為萬時華的詩集所作序，父子無以相傳之說，則是間接否定了舒曰敬對「世選」編排方式的意義。——舒曰敬特別重視家庭成員都有詩作的情形，儘管沒有藉此論證詩作上的淵源或傳承，但標註出父子或兄弟，應是刻意要讓讀者注意到這層關係，而更多考慮家庭因素的影響。相對於此，徐世溥直言父子無以相傳，等於把家庭因素視

<sup>86</sup> [清]徐世溥，《榆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1。

<sup>87</sup> [清]徐世溥，《榆溪逸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3，〈蓮鬚閣集序〉，頁7。此段話末尾語句艱澀，但比對黎遂球《蓮鬚閣集》卷首的徐世溥序，在字句上並無差誤，請見[清]徐世溥，〈蓮鬚閣詩集原序〉，收入黎遂球，《蓮鬚閣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首，頁1-2。

<sup>88</sup> [清]徐世溥，《榆溪逸藁》，卷3，〈溉園詩集序〉，頁5。

為無意義，而跟舒曰敬在意見上歧異。<sup>89</sup>

徐世溥更進一步說明自己的主張，他說：

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為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

徐世溥一方面擺脫復古派的「詩必盛唐」之說，一方面則又從詩本自然的主張，表示不同人有不同詩，講究個人的個性。這種自我個性的展現，跟公安、竟陵的主張相近，所以竟陵派的代表人物譚元春（1586-1637）過南昌時，包括徐世溥、萬時華、喻全祀及其子喻周等人，皆與譚元春聚會，在三洲唱和。<sup>90</sup>

從舒曰敬到年輕一輩的小讀書人，不僅從以詩為主轉變為以制藝為主，即連對詩作傳承及見解也有變，於是遂如清初計東（1624-1675）所說：

予見近代江西詩家，如《三洲唱和集》所載，陳大士（按：陳際泰）、萬茂先（按：萬時華）、起先（按：萬時升）、徐巨源、喻仲延（按：喻全祀）、景孟（按：喻周。景孟應為京孟之誤）所作五言古詩，及巨源、陳士業、陳伯璣（按：陳允衡）、王于一（按：王猷定）論詩諸書序，不皆祖述其鄉之詩派，乃知天下士但當以其才調抒寫性情，與天下士相酬應，固不必操其土風也。<sup>91</sup>

計東所據，正是南昌諸人與譚元春在三洲的唱和，而「不皆祖述其鄉之詩派」的斷語，則凸顯出明末江西詩壇兩代之間的不同走向與分歧。

<sup>89</sup> 徐世溥也有自己的選集，該書今已不傳，據萬時華說：「巨源近鳩窩內之能詩者，得三十餘人，曰《友聲》，且首美周（按：黎遂球）。」〔明〕萬時華，《溉園二集》，卷2，〈與黎美周〉，頁46。加上徐世溥說：「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清〕徐世溥，《榆溪逸藁》，卷3，〈食研堂集序〉，頁13。推測此選本就是從他所認定能詩的四十餘中選錄的。這跟他說萬曆五十無詩的立場相合。在徐世溥看來，萬曆朝無詩，須至今日才有詩。

<sup>90</sup> 〔清〕徐世溥，《榆溪逸藁》，卷3，〈三洲唱和詩序〉，頁18。

<sup>91</sup> 〔清〕計東，《改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文集卷4，〈南昌喻氏詩序〉，頁9-10。

## 五、小結

過去較少人談及明中晚期江西詩壇，而即使談及，也較側重在士紳余曰德與宗室朱多燿共同主持的芙蓉社。由於宗室的身份特殊，連帶使得江西的詩社活動較精英化，同時有一部分會流於宴遊逸樂。因此本文注意到萬曆中期成立的匡山社，以及舒曰敬《皇明豫章詩選》。詩選有其久遠的傳統，但舒曰敬似乎還把詩選當作資料集看待，而以匡山成員為關鍵來蒐羅南昌府一帶的詩作，這也讓活動力較弱的匡山社，配合詩選，卻儼然形成與宗室所主導的詩社活動並行的另一條線。

舒曰敬所主導的詩選，納入一些小讀書人及邊緣人物，明末風氣已變，舒曰敬所想要拉住的小讀書人，卻已轉向制藝文社，並且形成一股更大的風潮。小讀書人從詩社流動到制藝文社，於是先有萬曆四十三年豫章社的舉行，舒曰敬的門人弟子名列其中，此後制藝文社的活動日益凌駕於詩社活動之下，制藝寫作成為主調。

至此，詩與制藝的關係也被重新界定。在舒曰敬，這是二擇一，所以他作為制藝名家，晚年卻選擇詩作。但在年輕一輩的小讀書人，他們則是以制藝為主，既有人只作制藝而不作詩，有人以制藝為主，而詩作為輔，即使是重視詩作者如徐世溥，也已有不同於舒曰敬對詩的見解了，於是徐世溥不願提供詩作予舒曰敬，以及間接批評舒曰敬的詩選及其立場。這也顯示，從芙蓉社到匡山社，再到詩選，已是復古派在江西的最後一曲，往後就翻到下一頁了。

本文於 2024 年 10 月 04 日收稿；2025 年 03 月 26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莊祐維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武林樵雲書舍刻本。
-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余曰德，《余德甫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22，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余劬蘭，《燕林藏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2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宋應昇，《方玉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6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江西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影印。〔明〕李夢陽，《空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李攀龍，《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胡維霖，《胡維霖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6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江西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17，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徐火勃，《鼇峰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五年[1625]南居益刻本影印。
- 〔明〕陳文燭，《二酉園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39，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7，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三年[1623]陳之蘧重刻本影印。
- 〔明〕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收入《四庫禁燬叢刊補編》，67，北京：北京出版

- 社，2005，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影印。
- 〔明〕喻均，《山居文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原刊本。
- 〔明〕舒曰敬，《舒碣石先生隻立軒稿》，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 39 年帥眾等校刊本。
- 〔明〕舒曰敬主編，《皇明豫章詩選》，收入《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第 282-28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據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影印。
- 〔明〕楊慎選編，《皇明詩鈔》，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陳仕賢刊本。
- 〔明〕萬時華，《溉園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4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明〕萬時華，《溉園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4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明〕熊化，《靜儉堂集》，收入《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第 12 冊，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 〔明〕戴九玄，《匡山社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1635]刻本。
- 〔明〕韓陽輯，《皇明西江詩選》，收入《豫章叢書》，集部 8，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 〔明〕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6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21]扶荔山房刻本影印。
- 〔清〕呂懋先等修，〔清〕帥方蔚等纂，（同治）《奉新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 785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同治十年刊本影印。
- 〔清〕計東，《改亭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十三年計瓚刻本影印。
- 〔清〕徐世溥，《榆溪逸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據清嘉慶刻本影印。
- 〔清〕徐世溥，《榆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 版社，2010，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梁章鉅，《制義叢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7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臨清咸豐九年[1859]刻本影印。
- 〔清〕許應鑠等修，〔清〕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 81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
- 〔清〕陳弘緒，《江城名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陳弘緒，《江城名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陳弘緒，《恒山存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陳玖刻本影印。
- 〔清〕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4 冊，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六[1687]年刻本。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熊文舉，《侶鷗閣近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2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2 冊，據清初刻本影印。

## 二、近人論著

- 伍曉蔓，《江西宗派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5。
- 吉川幸次郎，〈李夢陽的一個側面——古文辭的平民性〉，收入氏著，章培恒等譯，《中國詩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頁 323-340。
- 余來明，《嘉靖前期詩壇研究（1522 - 1550）》，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 李聖華，《初明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張清河，《晚明江南詩學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 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發展與動向〉，《新史學》31：2（2020），頁 65-115。
- 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 陳國球，〈《唐詩品彙》對明前七子及以前的詩論並無影響〉，《嶺南學報》，新 1（1999），頁 416-552。
- 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 劉坡，《李夢陽與明代詩壇》，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鄭利華，《明代詩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鄭利華，《前後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Shu Yuejing's "Imperial Ming Poetry Selection of Yuzhang": The Div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Jiangxi's Poetry Circle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ang I-Hsi\*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iterary dynamics of late Ming Jiangxi through the lens of Shu Yuejing and his compilation, *Huangming Yuzhang Shixuan* (Imperial Ming Poetry Selection of Yuzhang). I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Jiangxi's poetic societies from the Furong Society to the Longguang and Kuangshan societies, highlighting th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gentry. In response to Wang Shizhen's critique that "there is no poetry west of the Yangtze," Shu Yuejing devoted his later years to compiling this anthology to assert Jiangxi's poetic legacy. The anthology is centered on the Kuangshan Society's members and exclude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ristocracy, creating a poetic tradition that ran parallel to that of the aristocrats. However, as the literary trend shifted toward *zhiyi*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younger scholars gravitated away from poetry societies toward essay-writing clubs. Shu Yuejing's anthology thus represents the final chapter of Jiangxi's revivalist poetic tradition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new literary trends.

**Keywords:** Shu Yuejing, *Huangming Yuzhang Shixuan*, Kuangshan Society, Jiangxi poetry, revivalist tradition, eight-legged essay, late Ming literature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